

总而言之，我自1917年涉足政治学专业至今已有70年矣。我一向认为，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1949年以前，基于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的理想，我不但著译了几部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论述中国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制度的书籍，而且也写过大量抨击时政、评述时势、论证国际关系对策以及政治学书评等类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尔后我身受逆境的折磨，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我国被迫中断将近30载。1978年以

来，政治学在中国又重新恢复应有的地位和声誉，越来越多的学生、学者和政府的文职人员都逐渐认识到学习政治学和研究政治学的重要性。我以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政治学也要注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分析方法，为解决人类社会政治活动和组织制度的新问题服务。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尤其要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服务，此乃政治学具有不朽生命力之所在。

至于我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难忘清华

○薛传钊（1950—1952 经济）



薛传钊学长近照

我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父亲的失业和工作的频繁变动，从小跟着父母逃难，从湖北、广西、江西、福建、广东、贵州，到四川，流离颠沛，辗转数年。小学和初中是在停停打打、时断时续中度过的，一共读了不到三年。抗战胜利后，我才到广州

培道女中念完高中。当时正值全国解放，1949年夏我从香港飘海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社会系，1950年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至中央财经学院工业企业管理系，1953年夏毕业。

虽然在清华只读过短暂的两年，但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转学去清华

在燕京大学的第二学期结束了。一年里关心我的同学们一直从经济上支持着我，维持着我的温饱，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但我总觉得如果能得到学校的助学金，会觉得更自在一些。正当学期结束，暑期又是大学招生的季节，我想到何不到国立学校去上学呢？那里是有助学金的。基于这一点我打算转学了。

当时也碰到一个难题：转学考二年级

□ 回忆录

经济系的插班生比较合理，但据说录取的机会比较小；如果去考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的机会会多一些，但要多读一年。左思右想，最后考虑到自己家境并不好，还有等待上学的弟弟，应该尽可能早点毕业、早点工作。于是，整个暑期我一心一意地为转学考试复习功课，报考目标就是清华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总算考试通过，如愿转学。离校时，我没多说一声再见，默默地离开了难忘的未名湖。

初到清华

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因而对清华园多了一份痴迷和敬仰。

清华经济系在清华虽不像工学院的电机系、航空系，或理学院的物理系那么响亮，但也是清华法学院的名牌系，有不少知名教授，特别是陈岱孙教授在经济学界负有盛名，著名的《资本论》中文译者王亚南教授，在解放后也在清华经济系任过教。

当我得知被清华录取后，很快就从燕京校园搬到了清华园的静斋。静斋是当时的女生宿舍楼，新生绝大部分都住在一层，老同学住在二、三楼。我住的那间房里，大部分是一年级的新生，只有李生荫、金方西和我是二年级的转学生。房间不大，却放着四张双层铁床，住八个同学。中间靠窗处放着几张小桌子，平均到每人不能占用一张桌子和凳子。但同学们都很谦让，多主动要求睡上铺。房间虽然挤了些，但行李都能放得下，各人的枕边、床脚都不会闲着。因房小人多，一般都要到图书馆和教室去做作业、看书，直



证上的照片
薛传钊学长在清华学生

到晚上才回宿舍。图书馆人满为患，早已不敷使用。为了借参考书或阅读，同学们往往在晚饭前就把书包预先放在图书馆的桌面或座位上，去占一席之地。否则只好到教室里借着发黄的灯光阅读，而且借参考资料也不方便。不过，大家都能理解这是发展中的困难，没有什么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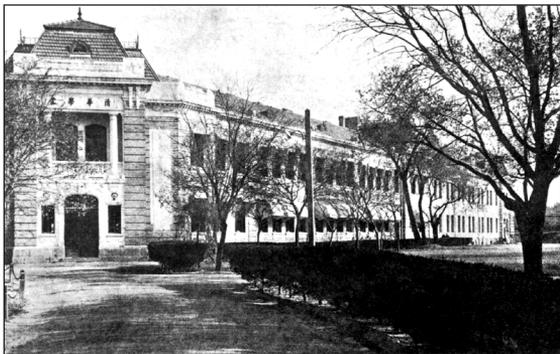
清华的同学生活大都比较朴素，穿着并不讲究。冬天还常能看到穿着很旧的深色布衫罩着长棉袍（当时称为“大褂”）的男同学；也有一些穿不上袜子，拖着一双又旧又破的球鞋过冬的同学。打着补丁的衣服更是随处可见。伙食水平也不算很高，一桌八人，四碗菜。先到的同学，把四碗菜分成八份，一般以青菜为主。主食是高粱米，也有窝头，发糕很稀缺，但主食不限量。大家站着，围着桌子用餐，记得一个月的伙食费约6到7元。一些班干部常常端着饭碗，边吃边到周围饭桌聊天，谈国家大事或班里的工作；有的到饭厅外的壁报栏（过去称“民主墙”）看“新闻”。每天用餐时间是十分热闹的，中午食堂里总会响起广播，传递着校内的各种信息，或是国家大事，有时还播放一些歌曲，成为当年的饭厅一景。

清华的学风

清华的学习风气真可谓不同一般。在校园里总能看到那些夹着书本和计算尺的同学匆匆上图书馆，那准是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园的树林深处总能听到文学院的学生在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外语。绝少有人在校园里聊天或闲逛。相反，你总会听到这个系、那个班的那些成绩惊人、出类拔萃的同学们的传奇性故事。你如果去参加一些讨论会或座谈会，也会经常听到一套又一套滔滔不绝、不同凡响、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可谓高手林立，人才辈出，不少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勤奋、自觉是必然的，像我这样根基较差、效率较低的同学，总免不了产生几分自卑。当时的考试、考核非常严格，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被开除，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要留级（只许留级一次）。对我来说，当时不求高分，但求通过。

经济系二年级专业课程的比重已经比较多了，如统计学、会计学、货币与银行等课程的课时占了较多的份量；基础课还保留了政治经济学、俄语和体育。整个二



清华学堂旧影

年级的课程排得比较满，还有许多讨论辅导课，课外的专业报告也接连不断。在清华和燕京上课是有些区别的。主要是清华的学生人数多，不能在听课和学习过程中随时提出问题讨论，师生之间的交流和融洽程度，不像燕京那样紧密。在清华的学习中主要靠自己钻研，自己来解决。

大学应有大师

我进清华的时候，无论是理、工、文、法、农学院，都是大师云集，举国闻名者何止数十上百人。我们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老师是我国经济学泰斗，经济系的主要课程“财政学”就是由他来讲授。这门课本是为三年级同学开设，我们这些刚转学到清华的，也总惦着去旁听他的课，尽早体会他讲课的风采和魅力。当时，我们都认为“财政学”是一门非常深奥、难懂的课程。到校不久，我们终于踏进了陈先生的课堂，全神贯注地先听为快，并努力记好笔记。陈老师讲课十分严肃，他有理有据，侃侃道来，既旁征博引，又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内容精炼而丰富，逻辑性强，很有理论深度。可惜我当时的经济学水平还缺乏根基，有些道理在课堂上一时消化不了。下课后，我再次细读所记的笔记，这才发现陈先生所讲的都是一个个没有任何多余词句、内容精彩、富有条理的文章。如果用心去理解和运用，对经济学是可以较快地登堂入室。

说起陈岱孙先生，这里还有两件事我必须提一下。

第一件事，陈老师不但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关心弱小、仗义执言的长者。记得1980年清

□ 回忆录

华校庆时，经济系的校友们在清华园聚会，陈老师也去了。当他问起我现在的工作岗位时，我如实汇报，我说从干校回京后，已不在冶金部机关工作，而分配到一个有几十名家属的“五七工厂”去了。陈老师一听就直言不讳地说：“冶金部还没有完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怎么把清华培养的人才送到一个家属工厂去了？”后来这个话传给了冶金部唐部长。唐部长很重视陈老师的意见，立即批示人事司、办公厅，把我从家属工厂调到了冶金经济研究所。

第二件事，陈老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为国操劳，体现出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在他晚年时，党和国家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老师为此奔走呼号。他曾亲自主编了《中国经济百科全书》《市场经济百科全书》。这时他已年近九十，他说，我是第一批到国外学市场经济的，现在祖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编好这部《市场经济百科全书》是义不容辞的。他的话语感动了全体编撰人员。他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亲自筹备编写和出版工作。在他的鼓舞下，我们研究所和我本人也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为这本书写了关于“工业”“生产率”等方面的几十个条目。陈先生对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多次批阅原稿，提出修改意见，极为认真。只可惜陈老师没有来得及看到这本书正式出版就与世长辞了。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年给我们上“统计学”的是戴世光教授。上课的第一天，他就给我们留下清晰的印象。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重点突出，逻辑严谨，课程总是安排得有条不紊。他从最基本的统计表如何划，一直到

各种不同统计对象的统计原理、分析方法，如何从繁杂的现象中去芜存精、表述清楚，都讲解得入木三分。这一年的统计学学习是我一辈子都受用无穷的。

我是到清华后才开始学俄文的。对于我们文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学俄文似乎是形势的需要，而不是学习的需要，因为我们的课本包括参考书都没有俄文本。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学俄文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课时很少，老师也少，但是学生很多，一般在大教室，甚至在大礼堂里上课。我记得光是俄文字母就学了很长时间，一年下来，收获有限，同学们似乎是在“随大流”。后来我在工作中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俄语，时至今日，连俄文的字母也记不全了。

马约翰教授的体育课

在清华给我留下记忆的另一门课程，居然是体育课，这可能因为我属于擅长形象思维的那一类型的学生吧。我在体育方面没有什么专长，运动时甚至是笨手笨脚。体育课当时是作为一门不可缺席、不可不及格的课程，因此学校对体育设施、师资都是相当重视的。我的体育老师是全国颇有名望的马约翰教授，上课他只讲英文，因为他的中国话是福建方言，我们听不懂。他上课时有一位助教，为大家作翻译，并做一些示范动作，或帮助同学掌握各项运动的要领。马约翰老师那时快70岁了，但体格健壮，冬天还穿着白短裤、白衬衫在户外活动，还经常打网球。他告诉我们，因为他经常运动，所以身体好。他每周给我们女生班上两节课，每天还要指导和督促我们进行“劳卫制”达标锻炼，工作非常认真、热情。

我们体育课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又独特的。每节课的内容是马老师自己编排，他自编自教，每节课的内容几乎都不相同。例如：为了锻炼反应能力，他事先在墙上画了许多白色的圆圈，直径不到半米，每个圈内写着不同数字，而且不按顺序排列着。上课时，让你站在离圈若干米的地方，持着一个篮球，快速顺时针自转。待你转得头昏眼花时，他发出命令，叫你把球投向几号圈。这样连续做10次，记录你投中次数，加以计分。一直练到你“及格”再让你去打篮球。

同样，在打排球之前要先练发球。在对方排球场上划了许多方格，每格都写了号码，然后，他发令要求发一个高飘球，或刹球，或低球，等等。要求你发到几号方块内，并一边做记录，直到大家都基本合格，才让大家练排球。总之，各式各样的球类、田径类的运动，都先要有一段基本技巧的训练，并在讲解各种规则之后再继续进行活动。

再如游泳项目，因为清华当时只有一个很小的室内游泳池，很难满足教学需要。老师就想出一个办法，在岸上用“干

游”的方法，训练“自由式”“蛙式”的姿势，并强调了姿势不准确的危害。练到姿势准确以后，才让你下池。

清华“劳卫制”达标项目的练习抓得很紧，要求全校同学人人达标。这样每天下午下课后，操场上、体育馆里，甚至空地上都挤满了人，分头在锻炼，一般每天要坚持30~40分钟。“劳卫制”的标准分为两档：及格和优秀，一般优秀的成绩要高于及格20%左右。例如跳高，女子要达到0.9米为及格，1.1米为优秀。如果有的项目达不到及格，但另一些项目达到优秀，则可以抵补。这些标准对我这个广东女孩来讲是难不倒的，我基本能达到优秀和及格，唯有一项万米长跑没有通过。那次测验是我第一次跑万米，跑到终点时，差一点就达标，但人已倒下。马老师把我测试各项的结果算了一下，认为我总体已经达标，因为可以用其他一些优秀项目来弥补。这时，他嘱咐我不要轻易跑一万米，因为我当时身体太弱、太瘦。老师还叫我每天坚持吃8颗花生米，要挑又大又胖的吃。我还去练过射箭，以增加肺活量，增强胸肌。马老师亲自教我持箭、拉弓、瞄准，以及如何配合呼吸等。他大声对我说：“记住！8颗！”70年过去了，他的声音仍言犹在耳。

课外生活

在清华学习期间，学校强调对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改造，经常会邀请当时的社会名流、国家领导人来作形势报告。一些文艺演出也是围绕着阶级教育展开的，如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话剧《龙须沟》等。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校掀起了参军



（右）一九五〇年，薛传钊学长
与陈兆庄同学合影

□ 回忆录

参干高潮，体现出改造思想运动的成效。经过各种思想教育，我熟悉的同学大都自愿报了名，只有个别人没有报名，大家都认为为祖国献身是光荣的。因为名额有限，在全校两千多报名者中只批准了50位同学，我们班三十多位同学只批准了两人，但这个活动对所有同学都是一次深切的爱国主义教育。

1951年1月初，在大礼堂举行了为50位参军参干同学的欢送大会。校团委书记林寿屏和学生会主席凌瑞骥肩扛着光荣榜上第一、第二名同学和数十位战士列队走进大礼堂，全校师生沸腾了，这一活动也达到了最高潮。在等待批准期间，同学们都想为朝鲜战场的战士们作点贡献。许多同学写了慰问信，一些女同学为前线战士做棉手套。尽管大家都不善于缝纫，但这些手套都是经过各班同学的精心设计和缝制的。有的班做了能伸出食指扣扳机的样式，有的做了能活动手指的样式，有的在手套里放上一封热情的慰问信。记得我当时在学生会文娱部工作，为了介绍这些活动，还与学生会学艺部的钱宁同学合作，在校刊《人民清华》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战士掌心暖，同学手中线》。

周末，我一般不会进城购物，也不会去远处游览，因为我享受的是特级助学金，除了交付伙食费，所余有限，能买一包花生米或一两粒水果糖就算是很好的享受了。班上细心、热情的王淑华同学发现我连洗脸盆也没有，就悄悄地送我一只有大脸盆和一些生活用品；黄钦若还给我拿来一件厚厚的蓝布大衣，让我暖暖和和地过冬。

被推举到学生会工作

我转学清华不久，在没有思想准备的

情况下，被同学们推举到清华学生会担任了文娱部副部长。这项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但容不得推辞，班上的同学一致表示会全力支持我。

学校里的文娱工作内容实在太多了。每周要为同学放映一次电影，要组织各个社团开展活动，节假日前要组织推动的文娱活动就更多了。当时文娱部的头儿是周森，我负责的是社团工作，包括舞蹈组、腰鼓队、歌咏队、话剧组等。除了定期组织活动外，每逢节日就更忙了。既要演出，还要推广、示范。例如国庆节前或五一节前，为了做好游行及天安门前的联欢活动，舞蹈组的成员除了要准备好几场表演的节目外，还要负责教会全校各系各班文娱干事跳若干个新舞。文娱干事学会之后，他们再回到各自的系里、班里，教会全体同学。有困难的还可以请舞蹈组的成员去辅导。其他的社团则各自组织排练新节目。节目的来源是请校外专业或业余单位来辅导，更多的是自编、自导、自演。到演出时一般都能拿出新的、结合形势的好几个节目。从这些工作和各社团的演出水平中，可以看出清华确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大家不但功课好，而且很多同学是多才多艺的。各种人才汇集到了清华，只要领导提出要求，学生会稍加组织推动，很快就可以拿出一台五彩缤纷、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

1950年11月的一天，上午最后一节课快要下课了，广播通知所有同学到大操场集合。学生会主席凌瑞骥同学站在大操场高高的主席台麦克风前，慷慨激昂地传达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所有学生会的委员们立刻集中开会，为的是布置一台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

演出，这场演出只有2—3天的准备时间。随后文娱部立刻组织各路能人研究策划。主席集中意见，安排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晚会演出的大致内容。当即明确分工，并分头行动起来。话剧组负责新编一出活报剧，指定专人通宵写出剧本，并分头安排演员，配合演出的乐队，灯光、布景、服装、道具等一整套人员，都要在第二天下午课后集中，听剧本要求，分头准备排练。排练时间十分短促，还配了不少提台词的人员。其他社团也各自领了任务，一边编，一边练，在排练中随排随改。到了周末，大礼堂里一台两个多小时的文娱演出就有声有色地上演了。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教育和锻炼。我当时的角色是前台负责人，其实当时我并不清楚具体该如何组织，是高年级的能人在旁不断提示、指导下，协调前、后台的节奏，以及上下节目间的衔接，真是紧张得很。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文娱不仅要抓现实的活动，还要抓长远的活动，做到各个社团都有储备。在



1950—1951年间，薛传钊（前排左2）与学生会文娱部等同学的合影

舞蹈组的同学中，我们请那些功底好、学得快、善于教舞的同学在周末或课余，到一些专业学校或文娱单位，去学一些新的表演舞和集体舞，学会之后再回来教大家。同时也找机会邀请一些舞蹈专家来校讲授。我们曾邀请过中国舞协的孙晓邨星期日来校讲课，整整一个上午，他在草坪上边讲授边示范，热心地介绍了我国各主要少数民族舞的特征、文化背景、发展渊源等。

在清华园里还经常有机会欣赏一些国内外著名团体和个人的演出，有时也有一些交流。有一次京剧名家张君秋来校演出。我们对京剧的化妆十分好奇，特别是男扮女装。于是，我们提出要求，想参观他的化妆全过程，没想到他欣然答应。他一边化妆，一边给我们讲解，从京剧的脸部扮相到包头，到如何把大脸盘变成秀气的闺秀，如何戴头饰、甩水袖、走云步，做了耐心细致的讲解。还有一次是苏联的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那天，她来清华参观，应大家的要求跳了一小段。最后，她邀请了几位同学，作为她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制作纪录片的观众。我有幸被邀，看到了她的精彩表演，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到怀仁堂。

在节假日或周末的晚上，除电影演出外，我们还组织各种娱乐晚会。我们常常在三院教室举行棋类、猜谜语活动，举办古典音乐欣赏，开辟游戏室，教交谊舞等。各活动室都挤得不行，十分热闹。

每逢国庆节、五一节要做的事就更多了。全校师生为了参加游行，或是到天安门前联欢，都要学会一些新的集体舞，还要学唱一些

□ 回忆录

新的歌曲。这些教歌、教舞的任务，都是在节日前十天左右开始安排和练习。

为完成以上任务的一些后勤工作也是十分艰巨的。有一次排演一个新疆舞和一个西藏舞，一切都准备就绪，就差服装。我和熟悉北京城的马德容同学一起进了城，先找了几个专业团体，多次碰壁还是借不来。我俩绞尽了脑汁，想到民委试试看。这次出乎意料地顺利，接待我的工作人人员问清来意，经过请示后，带我们参观了礼品陈列室，我们看到了藏服、新疆帽，但没有新疆女服，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地区送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礼物。我们告诉他回去确定演出时间后再来，并再三致谢。

可是新疆维吾尔族的服装却还没有解决，而已到黄昏时刻。想来想去，不知怎么灵机一动，就想到印度大使馆借两套白色长裙，不是很像维吾尔人穿的裙子吗？于是，两个人风风火火地直奔东交民巷。这次也很顺利，一下子就有人把我们引到大使馆内的办公大厅。一位工作人员客气地问了我们来意，高兴地说：“好，我夫人的就可以借给你们用，只是今天拿不来，等你们什么时候用，就可以来拿。不过有一个请求，希望去学校观看你们的演出。”我们没表态，只说来取衣服时再告诉演出的时间。表示感谢后，我们就赶快回学校了。

第二天，大家正为解决了服装难题而高兴时，学生会主席把我们找去了。他笑咪咪地说：“你们好大的胆子呀！连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也敢借，还跑到外国大使馆去借衣服！你们真行呀！但我告诉你们不能借！”他讲了一大堆理由，最后他说：没关系，是我事先没交代好。你们赶

快进城告诉他们不演了，服装也不借了，不就行了吗！我们听了之后，半懂不懂地照办了。最后，还是大家拆被单改装了几套服装，问题才得到解决。

在清华经济系二年级的一年里，过得热烈、繁忙。业务学习上固然有不少的收效，同时在思想和工作方面的锻炼和收获更是前所未有的。

离开清华

1951年的暑假，我们正在北京城里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实习。原计划实习两个月，大概一个半月左右时，学校通知我们立即返校。原来国家决定，让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的法学院全体师生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一年。这是一次完全脱离专业学习，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锤炼。同我们一块参加土改工作的还有全国政协的部分委员，以及财经、政法、文教、卫生等系统中的一批知名人士。由于广西当时土匪猖獗，因此还有一批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干部和战士配合，是一支浩浩荡荡很壮观的队伍。

我们先在北京集中学习，四校同学集中住在北京大学的红楼，学形势，学政策，学工作方法，了解当地情况。1951年8月下旬，大家高高兴兴地扛着行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前门火车站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令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同志亲临火车站，他老人家充满着热切的期盼，向每一节车厢的同志们挥手送别。

我们在广西参加了一整年的土改工作，回到北京后又经历了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我最后一年的大学学习是在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完成的。